

农奴戟直捣孔家店

从曲阜“三孔”有关资料看劳动农民反孔斗争

朱 活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农奴戟直捣“孔家店”

——从曲阜“三孔”有关资料
看劳动农民的反孔斗争

朱 活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99·46 定价：0.22元

前 言

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孔斗争，是他们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反动派把维护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孔丘说教抬得越高，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就越坚决。

革命必须反孔，这是我国劳动人民两千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总结。

孔丘的全部说教，都是为了论证剥削有理，压迫有理，造反无理，是反动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。劳动人民对孔丘及其反动说教从来就是极端仇恨和深恶痛绝的。历史上劳动人民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时，总是要在思想领域里对孔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把这个剥削阶级的“圣人”揪上历史的审判台，给予严厉的斥责和批判。

早在春秋末期，烽火连天的奴隶起义，从根本上摧毁和瓦解着奴隶制度。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同孔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。当面揭穿孔丘是“巧伪人”，是口蜜腹剑、面誉背毁的两面派，是“不耕而

食，不织而衣”，吮吸人民血汗的寄生虫；是“摇唇鼓舌，擅生是非”，官迷心窍，欲求富贵的反动政客。公然宣布：“丘之所言，皆吾之所弃也。”断然否定了孔丘的反动说教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孔丘是真正的大盗。

到了封建社会，孔丘用来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和宗法制度的一套反动说教，经过地主阶级一番改造，给予新的阶级内容，就又变成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，成为统治劳动农民的精神枷锁。体现“三纲五常”、“君权神授”等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权（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），就**“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”**。因此，我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，从陈胜、吴广到太平天国，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孔孟之道。

陈胜、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豪迈地提出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！”断然否定“君权神授”，批判了孔丘的“天命观”和他那一套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反动说教。

西汉末年，赤眉军曾“攻拔鲁城”。（《后汉书·刘玄刘盆子列传》）

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提出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”要变地主阶级的“苍天”为农民阶级的“黄天”，从根本

上否定了儒家所鼓吹的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反动谬论。起义军直捣孔家店，使阙里“百祀堕坏，旧居之庙，毁而不修；褒成之后，绝而莫继；阙里不闻讲诵之声，四时不睹蒸尝之位。……大道衰废，礼学灭绝，三十余年。”（魏黄初元年《鲁孔子庙之碑》，现存孔庙）

唐朝末年黄巢起义，自称“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”。不仅要“冲天”，即冲破“君权神授”，把封建皇帝拉下马；而且首次打出了“均平”的旗号，反映了劳动农民反对封建制度不平等现象的强烈要求。“均平”口号的提出，是农民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。

北宋初年爆发的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明确提出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是对唐末农民起义“均平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北宋末年方腊起义，明确地把“法平等”的口号写在战斗的旗帜上，对孔孟之徒宣扬的“尊卑有序，贵贱有别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。南宋初年，钟相、杨么起义，进一步提出了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革命纲领，对封建等级制度及维护这种封建制度的“三纲五常”，予以根本的否定。

从宋代开始，我国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。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，更是大演尊孔丑剧。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，不断给孔丘的亡灵加官晋爵，把曲阜阙里孔庙一修再修。对孔丘的嫡系

后裔特别“眷顾”，曲阜“衍圣公府”遂成为一座拥有世袭特权的大地主庄园。曲阜“三孔”（孔庙、孔府、孔林）既是历代封建帝王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据点，也是维护其反动统治、镇压农民起义的恶毒工具。

封建社会后期，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。他们高举“批判的武器”，进行“武器的批判”，起义大军直捣“孔家店”，以革命的暴力，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尊孔活动。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，遭受孔府残酷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，特别是孔府的佃户、庙户，也在“孔家店”后院里不断燃起抗租抗差的斗争烈火，并纷纷参加起义军。他们杀进孔丘庙堂，捣毁孔丘偶像，焚烧儒家经书，镇压反动儒生，表现了革命农民对孔丘及其反动说教的切齿痛恨，要求摧毁封建土地关系，冲破封建四权束缚的坚定意志和大无畏战斗精神。

农民起义英雄们，在与反动势力进行反复搏斗的过程中，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，斗争的水平越来越高，他们是封建社会反孔斗争的主力军。在农民军的革命暴力冲击下，历史上一顶顶皇冠落地，一个个封建王朝被动摇、被推翻。农民军的铁扫帚所到之处，封建土地关系被打乱，宗法等级制度被否定，封建政权被摧垮，孔孟之道被涤荡。农民革命英雄们，用自

己光辉的战斗业绩，在中国人民反孔斗争史册上，谱写出一首又一首壮丽诗篇！

封建社会里，农民阶级毕竟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，还不可能提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，也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去彻底战胜孔孟之道。这个历史使命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。但是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：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，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，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，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”。

林彪一伙孔孟之徒，祭起孔丘“克己复礼”的破旗，妄图篡党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。他们竭力鼓吹孔丘的反动说教，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，恶毒污蔑广大农民是“愚夫愚妇”，胡说什么农民战争只会带来“尸暴遍野，血流成河”的“灾难”。无耻的诽谤，丝毫无损于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功勋。

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”。农民革命英雄们在长期阶级斗争中认识到，革命必须反孔。他们反孔的最终目的是反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专制制度，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。他们革命的

逻辑是“斗争，失败，再斗争，再失败，再斗争，直至胜利——这就是人民的逻辑，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”。历代农民起义的雄辩事实，深刻地批判了《水浒》宣扬的“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”，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。

当前，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，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，团结一致，深入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，胜利地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。结合这场斗争，研究我国历史上劳动农民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，继续深入批孔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这本《农奴戟直捣“孔家店”》的资料来源，主要是曲阜“三孔”，其中也有一部分来自邹县孟庙的碑刻、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史料。内容只限于金末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山东地区农民起义军直捣“孔家店”的光辉战斗业绩。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，难免存有缺点和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红袄军火烧阙里孔庙	(1)
红巾军威震孔孟老巢	(6)
刘六、刘七直捣“孔家店”	(13)
徐鸿儒起义夷平“亚圣府”	(19)
大顺军进军阙里	(26)
孔振公造反祀田	(30)
天理教军杀进孔氏家庙	(34)
南捻北进三打曲阜县城	(39)
文贤教军尼山安营	(44)
孔府佃户后院点火	(51)

红袄军火烧阙里孔庙

金末红袄军起义，红旗似海，刀枪如林，熊熊革命烈火烧向曲阜阙里孔丘的庙堂。这是我国劳动农民反孔斗争中的创举，是我国农民战争史册上的新篇章。

金朝（公元一一一五——一二三四年）是女真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。在这个反动政权统治下，封建地主阶级对各族劳动人民，特别是农民，进行着极为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。

我国封建社会自宋朝以来，开始走向没落，土地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。金朝统治时期，大量良田沃土被政府、宗室、贵族及汉族地主所霸占。据《金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一百七十户宗室，就霸占民田三千六百多顷。大批猛安、谋克户^①内迁屯田，霸占的土地更为惊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河北、山东地区被圈占的民

^①猛安、谋克户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，公元一一一四年，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，十谋克为一猛安。金熙宗以后，成为军事编制、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。

田就有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。（《金史·食货志》）汉族地主也同样掠夺了大量“腴地沃壤”。（《金史·高汝励传》）劳动农民纷纷破产，沦为女真贵族、汉族地主及猛安、谋克的佃户或奴隶。金朝统治者不时向农村大量“签军”（强征壮丁），每一次“签军”，动辄十万、几十万人，服装、口粮都要自备，更使广大农民迅速破产。当时山东地区的广大劳动农民“贫悴饥瘦，无力以耕”。（《大金国志》卷二十一）

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”（毛主席：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）在金朝统治的一百二十年中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，连绵不断。

金朝统治者，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，一面依靠军队，采取高压政策；一面大搞尊孔活动，鼓吹孔孟之道，妄图以此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。金章宗完颜璟时，对曲阜阙里孔丘的庙堂进行空前的大修建，花了四年多时间，仅建筑材料费用就消耗了七万四百六十余缗（一缗为铜钱千枚）。修建孔庙的工匠民伕都是从曲阜附近州县征调的。地主阶级尊孔建庙，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场灾难。

哪里有剥削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有斗争。公元一二一一年，即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大安三年，山

东青州（益都）红袄军首先起义（因为起义军的首领多穿红袄，所以称为“红袄军”）。公元一二一二年，以刘二祖为首的红袄军在沂蒙山建立了根据地，战斗于淄、沂二州。公元一二一四年，另一支以周元儿为首的红袄军，驰骋于河北深（河北深县）、祁（河北祁县）二州，叱咤于束鹿、安平、无极等县。于是山东、河北广大地区，出现了金末农民反封建、反孔学斗争的新高潮。

红袄军战斗的地区是以山东青州、潍州（潍县）、莱州（掖县）和现在江苏北部为中心，北到今河北沧县，西抵太行，东达海上，南至淮北。红袄军高举革命的武器，批判孔孟之道，对孔学进行了无情的扫荡。

红袄军高举造反大旗，直捣“孔家店”。公元一二一四年，郝定^①率领的一支红袄军猛烈冲击了曲阜阙里孔丘庙堂。郝定山东泗水人，是红袄军著名首领，由他率领的红袄军，多数就是曲阜附近州县的贫苦农民。他们对金朝统治者大演尊孔丑剧、大建孔丘庙堂所带来的灾难感受最深，对曲阜地区的土皇帝“衍圣公”更为愤恨。据《曲阜县志》的记载：金宣

^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、《大金国志》记载为郝八（名仪）。钟渊映：《历代建元考》，李有棠：《金史纪事本末》都说郝八就是郝定。

宗完颜珣贞祐二年（公元一二一四年）正月二十四日，郝定这支红袄军势如暴风骤雨，一举攻占了阙里，一把革命的烈火，使那座反动派演出尊孔丑剧的大成殿，以及祀奉孔丘徒子徒孙的“两庑”，统统化为灰烬。孔庙里的所谓“圣迹”——孔丘“手植桧”，也被红袄军付之一炬，“手植桧三株，亦被毁无孑遗”。（《曲阜县志》卷二十六）红袄军采取的空前革命行动，使得这座重修不久，神化孔丘、鼓吹复辟的地方，顿时“殿堂庑廊，灰尽什伍”。（同上）

红袄军的革命行动，把孔丘五十一代孙“衍圣公”孔元措吓得抱头鼠窜，仓惶逃命，依附其金朝主子到汴梁（河南开封）去了。“衍圣公府”威风扫地，“一蹶不振，久而未复”。（《阙里志》卷十八）孔老二的庙堂也无人奉祀，破败荒凉。孔元措只有捡起几块烧焦的桧木带到汴梁，请木工刻成孔丘的偶像以作“悼念”了。（《孔氏祖庭广纪》卷九）

红袄军对邹县“孔家店”二掌柜孟轲的庙堂也采取了同样的革命行动。现存邹县孟庙里有一块《邹孟子庙碑铭》，就记下当年红袄军冲击孟庙的反孔业绩。这块碑文中记有“甲戌（即金贞祐二年）毁于兵，惟门垣在，几八十年”。

在红袄军反封建、反孔学斗争的鼓舞下，广大农

民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。郝定领导下的红袄军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六万人的革命大军，自公元一二一四年春迄一二一七年夏，驰骋于滕、兗、单诸州，叱咤于莱芜、新泰、曲阜、泗水、邹县等十多县之间，并在东平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，国号大汉，年号顺天。“顺天”就是顺农民之“天”，革命农民要拿起刀枪造反，建立自己的政权，捣毁“孔家店”，推翻金王朝。

红袄军以革命暴力攻占阙里、邹县，火烧孔孟的庙堂，是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上的一块光辉里程碑。

红巾军威震孔孟老巢

元朝（公元一二七一——一三六八年）统治者“入主中原”之后，在一批反动儒生出谋划策之下，一个个都成了虔诚的孔孟信徒，竭力鼓吹“君臣父子”，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孔孟滥调，特别是把反动的程（程颢、程颐）朱（朱熹）理学接了过去，用所谓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反动说教来禁锢人民的头脑。

元朝统治者在吹捧孔孟之道的同时，对孔丘的亡灵封官晋爵，大修阙里孔丘庙堂。不仅给孔丘戴上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的桂冠，而且把孔庙升级到“以侔王居”。现在曲阜孔庙围以红垣，配以角楼，俨然一座封建王宫，就是从元朝大修孔庙开始的。孔庙十三碑亭中有几块元朝的尊孔碑，其中元武宗海山于大德十一年（公元一三〇七年）立的加封孔丘碑（此碑大德十一年九月立，武宗五月即位，次年改元），就是一块空前的反动尊孔文告。这块八思巴文^①和汉文的合

^①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，命国师八思巴所制定的蒙古新字。

刻碑，一开始就吹捧孔丘说：“盖闻先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明，后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法。”碑文最后又道出了他们尊孔的反动政治目的在于“尚资神化，祚我皇元”。就是要用孔丘来进行神道说教，麻痹、欺骗劳动人民，维护元朝的反动统治。

元朝的封建政权，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联合专政。在元朝反动统治下，土地集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一个大官僚伯颜通过“赏赐”的手段，就霸占了良田两万顷。一座大承天护圣寺院，两次通过“赐田”的手段就掠夺霸占了山东民田三十二万四千多顷。（《元史·文宗纪》及《元史·顺帝纪》）广大劳动农民失去了土地，沦为佃户和驱口。佃户可以随土地被买卖，连子女也要受地主的奴役。驱口就是奴婢，奴婢子女永世是奴婢。当时的市场上公开设立“人市”，买卖奴婢，与牛马无异。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，激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。元朝统治的九十多年中，农民暴动、农民起义从未间断，到了公元一三五一年（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），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大起义。

在山东，从元顺帝爬上皇帝宝座不久，益都路的沂水、日照、蒙阴、莒县一带农民起来造反，到公元一三四二年初，山东及河北南部的农民起义达到三百

多起。（《元史·顺帝纪》）元顺帝为了扑灭农民造反的烈火，急忙紧敲尊孔锣鼓，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尊孔丑剧。从元统二年（公元一三三四年）到至元二年（公元一三三六年），用了三年的时间大修阙里孔庙，花费“中统楮币”三十一万四千四百缗。而当时黄河却濒濒决口，山东许多地方正出现“民之死者过半”的惨景！

红巾军大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韩山童和刘福通，提出了“天雨线，民起怨，中原地，事必变”^①的口号发动群众。“事必变”就是造反有理。

公元一三五一年，元朝统治者强征十五万农民，调动了两万军队去开黄河河道，民怨沸腾。韩山童和刘福通见到时机成熟，点燃了“挑动黄河天下反”的革命烈火^②。“天下反”集中表达了劳动农民要用革命暴力推翻元朝残暴统治的强烈愿望，对孔丘及其徒子徒孙所宣扬的“天命”、“天理”予以根本否定。

① “事必变”民谣见《古今风谣拾遗》卷四。《元史·五行志》载，顺帝时彰德下雨如绿色的线。

② 公元一三五一年，北派白莲教主韩山童和刘福通利用元朝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，强征民伕，调动士兵，另开河道，民怨沸腾之际，发动武装起义。他们编了一首童谣：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。又在将开河道的黄陵岗（河南兰考县东北）埋上一个背上刻有“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此物一出天下反”的石人。以此来鼓动群众，点燃红巾军起义的烈火。